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18 年第 4、5 期合刊 · 总第 700、701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德国问题研究所·《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政治动态

- 大联合政府即将成立，内阁名单曝光
- 主流政党内斗升级，德国进入政治动荡期
- 默克尔接班人浮出水面，右翼少壮派挑战默克尔
- 默克尔称要警惕中国扩张巴尔干？“中国渗透论”显示欧洲深刻的不自信

经济纵横

- 联邦法院判决，柴油车禁行，各地说了算

1 大联合政府即将成立，内阁名单曝光

社民党 4 日通过全党投票，以 66% 的赞成票同意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从而结束了持续 5 个月的政治僵局，新一届德国政府有望在 3 月底组建完成，默克尔将第四次出任总理。

社民党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约 37.8 万社民党党员参与投票，投票率约 78%。其中，近 24 万名党员支持再次同联盟党组建大联合政府，占投票人数的 66%，超过预期。

联合政府协议签署后，德国联邦议院将在 3 月 14 日举行投票，正式选举默克尔担任总理。这是默克尔 13 年总理生涯中第三次与社民党组建大联合政府。

各方态度不一，反对派嘲讽

近几个月来，围绕着是否与保守党重新组建大联合政府，社民党内部发生严重分歧，社民党主席舒尔茨因在组阁问题上出尔反尔、改变立场而被迫让出党首位子，宣布辞职。代理主席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和即将在 4 月份接任舒尔茨的候任主席安德烈娅·纳勒斯（Andrea Nahles）作为社民党内的赞同组阁派，在与基民盟的谈判中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在一些关键议题以及内阁部长职位分配上迫使默克尔做出让步，最终达成组阁协议。

朔尔茨在投票结果揭晓后表示：“对社民党全体党员来说，做出这一决定并不容易。在协议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变得更加团结，从而能够在未来重塑我们党的进程中奋勇向前。”

反对组阁协议的社民党代表、青年团（Jusos）主席凯文·吉纳特（Kevin Kuhnert）在投票结果出台后表示：“我和许多社民党年轻党员一样，对于这一结果无比失望。但这是一个民主的决定，我们接受这一结果。”吉纳特表示，他将率领社民党内的年轻人继续推进党内改革，“我们将继续表达我们的不同意见，不仅是针对政治合作伙伴，也是针对我们自己党内。”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投票结果公布后掩饰不住喜悦，通过推特发文说：“祝贺社民党（在组阁问题上）给予了明确的结果，为了我们国家的福祉，期待着未来进一步的合作。”

基民盟秘书长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和提名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也发表声明或通过推特，对社民党通过组阁协议表示祝贺。

极右翼的选择党则通过社交媒体嘲讽社民党的投票，称在德国下一届议会选举前，社民党的支持率仍将继续下跌。“最晚到 2021 年，他们就将付出代价，”选择党在推特上表示，推文还配了一幅纳勒斯和默克尔的漫画，标题是“德国又一个噩梦般的四年”。

自民党秘书长尼古拉·贝尔（Nicola Beer）发了一条推文说：“社民党的投票结果不出预料。他们宁愿在与默克尔的再次联合组阁中被边缘化，也不敢重新举行新一轮选举。默克尔的担心结束了，她仍然可以继续留在总理府，但德国却渐渐地偏离了道路。”

左翼党联合主席卡提亚·基平（Katja Kipping）表示，社民党和保守党重新回归权力宝座，但权力已经“弱化”，宝座变得“冷血”。

绿党联合主席安娜莱娜·鲍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评论称：“政治僵局终于结束了，可喜可贺，我们将在联邦议院为气候、老年关怀和贫困儿童等问题上继续呐喊。”

内阁名单公布

在社民党党内投票前，围绕着可能组建的大联合政府内阁名单，各方颇多猜测，一些关键性的岗位更成为社民党与默克尔讨价还价的筹码。其中，默克尔最大的让步是放弃财政部长这一至关重要的内阁岗位，默克尔的政治盟友、现任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已转任联邦议院议长，财长一职将由社民党代理主席、汉堡市长奥拉夫·朔尔茨接任。此外，候任社民党主席纳勒斯此前已经出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

默克尔 2 月 25 日宣布基民盟提名的 6 位内阁成员，而社民党在 3 月 9 日也公布了内阁成员名单。内阁中最重要的经济部长一职，默克尔提名 59 岁的彼得·阿尔特迈尔。这位政坛老将在默克尔的上届内阁中担任总理府部长，被视为默克尔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和支持者。默克尔提名国务秘书黑尔格·布劳恩接替彼得·阿尔特迈尔，出任总理府部长。冯·德莱恩被提名为国防部长，他从 2005 年开始就进入默克尔政府。这两项提名都是为了保证默克尔政府的连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默克尔内阁 6 位部长人选中，女性占一半，“新面孔”占一半，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未来基民盟改革的大趋势，即女性化、年轻化。

据德国之声报道，在确定内阁人选时，为了挽救姊妹党基社盟的颓势，默克尔已经将 3 个部长级阁僚位子以及一个国秘级的总理府国务部长席位给了基社盟。基社盟去年 9 月在自己的大本营巴伐利亚州联邦议院选举中仅获得 38.8% 的选票，前景堪忧，如果默克尔不扶它一把，在今年 10 月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基社盟可能丧失目前保持的绝对多数席位。因此，在年初开始的谈判中，为了拉拢基社盟，默克尔不得不做出让步，牺牲原本可能属于基民盟的内阁席位，让给基社盟。除了 3 名部长外，另有多萝西·巴尔（Dorothee Bär，女）将出任新设立的负责“数字化事务”的国务部长，这一职务与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的职能部分重叠。

以下为新一届大联合政府内阁名单： ~

内阁职位	人员	所属党派
总理	安吉拉·默克尔，女，63 岁	基民盟
总理府部长	黑尔格·布劳恩（Helge Braun），男，45 岁	基民盟
财政部长兼副总理	奥拉夫·朔尔茨，男，59 岁	社民党
内务部长	霍斯特·泽霍夫，男，68 岁	基社盟
外交部长	海科·马斯，男，51 岁	社民党
国防部长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女，59 岁	基民盟
经济和能源部长	彼得·阿尔特迈尔，男，59 岁	基民盟
司法部长	卡塔琳娜·巴利（Katarina Barley），女，49 岁	社民党
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长	胡贝图斯·海勒（Hubertus Heil），男，45 岁	社民党
环境、自然保护、核安全部长	索尼娅·舒尔策（Svenja Schulze），女，49 岁	社民党
家庭部长	弗朗西斯卡·卡吉菲（Franziska Giffey），女，39 岁	社民党
卫生部长	延斯·施潘（Jens Spahn），男，37 岁	基民盟
教育和研究部长	安雅·卡利采克（Anja Karliczek），女，46 岁	基民盟
发展部长	盖德·穆勒（Gerd Müller），男，62 岁	基社盟

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部长	安德里斯·朔伊尔，男，43岁	基社盟
食品和农业部长	尤利娅·克勒克纳（Julia Klöckner），女，45岁	基民盟

2 主流政党内斗升级，德国进入政治动荡期

大联合政府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德国政治危机的结束，相反，因大选和组阁困境暴露出来的德国主要政党内部的矛盾和影响力下跌，却进一步增加了德国政治的不确定性。据明镜在线 2 月 16 日报道，社民党领导层遭遇党内公开怒怼，基民盟内部，默克尔的能力也被严重质疑，党内权威受到少壮派的强烈挑战。反思和改革成为两大主流政党新一轮执政周期的主旋律。

政党体系弱化和势力重组成为欧洲各国普遍现象

时间回到 2 月初，社民党高层在柏林举行闭门会议，讨论舒尔茨将主席一职让给纳勒斯的程序问题，几位党内大佬之前已经达成一致，舒尔茨辞职后，由纳勒斯担任社民党临时主席，等下一届党代会正式投票后，出任主席。

但这一计划曝光后，在社民党内引起强烈争议。社民党律师团认为，纳勒斯担任社民党过渡时期主席，从法律上并不合法。来自基层的抗议邮件雪花般地飞向社民党总部。社交媒体上，社民党成员怒骂高层顽固不化。3 名社民党地方党首甚至公开反对这一计划。

这是社民党领导层从未见过的混乱局面，来自党内草根基层对社民党领导层的怨气和愤怒，借着主席换人的契机，全面爆发。柏林总部内，与会的党内高层意见不一，时任汉堡市长的朔尔茨表示，无论如何也要继续按照这个程序推动主席换人计划。纳勒斯也同意，认为如果撤回计划，会让批评者得寸进尺，导致局面更加失控。

但是，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基层，社民党各州的党组织也有许多不同意见。最后，各方妥协，决定让朔尔茨暂时出任社民党代理党魁，等风波平息之后，再让纳勒斯正式上位。

这件事凸显出社民党目前的混乱局面。党内弥漫着不满和愤怒，不仅仅是年轻党员反对社民党与默克尔的联盟党再次组阁，更重要的是党内对社民党的领导层和政治文化产生了强烈的怀疑，高层对局势完全失去掌控，与基层组织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所有人都在争吵，尤其是外长加布里尔，更成为众矢之的。

基民盟内部，情况也好不了哪去，尽管默克尔刚刚展开她的第四个任期，但默克尔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她的政治神话开始破灭，围绕着默克尔试图将基民盟现代化的努力而产生的内部分歧，正一点点消耗着她的权威性，默克尔与党内年轻一代及保守派的矛盾日渐公开化。

政党体系的弱化和政治势力版图的重组不仅仅发生在德国，整个欧盟的民主体系都在经历类似的变化。在法国，传统的两大政党社会党和共和党目前在国民议会的席位只占四分之一。在意大利，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党异军突起，在 3 月 4 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拿下近 30% 的选票。只不过，由于德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默克尔政府的相对稳定，让人忽视了德国主流政党内部的矛盾。但是，围绕着政府组阁问题而持续数月的政治僵局，让这些矛盾突然集中爆发。

社民党：领导与基层割裂，互不信任

与联盟党再度合作，组建新一届大联合政府，并不能阻止社民党在党内混乱和民意低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社民党领导层已经丧失权威性和领导力，各州的社民党团

也是一片混乱，其中包括社民党最重要的地方党团北威州。

党内纪律涣散。社民党议会党团屡屡与领导层唱反调，社民党青年团公开反对社民党与联盟党联合组阁。3名并不出名的地方社民党员跳出来公开反对纳勒斯出任新的党魁。

社民党副主席拉夫·施泰格纳（Ralf Stegner）说：“如今，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对政治高层完全不信任的情绪，这种社会思潮的转变，同样反映在主流政党内部。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问题保持高度敏感，在坚持党的领导和满足基层党员诉求之间，准备把握平衡。”

基层党员对党内领导层不透明、暗箱操作的风格早已严重不满，他们要求决策公开化，要求在关键问题上发声。无论社民党，还是基民盟，党员构成也同以前不一样，更加多元化。社民党去年新注册的数万名党员中，许多年轻党员希望打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社民党政治文化。他们从小在社交媒体的浸染下，一种观点往往几小时内就能得到无数人的响应。党内高层的声音越来越弱化，因为越来越没有人听他们的。

这不是政治冷漠的问题，相反，在德国，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出家门，参与投票，越来越多的人对政治开始感兴趣，问题在于党内信任正在进一步削弱和萎缩。

社民党和基民盟的党员对此深感不安。长期以来居于执政地位和权力中心，社民党的左翼色彩和基民盟的保守主义腔调都已经被打磨得十分光滑，看不出两个政党原来的本色。他们缺乏特征，没有政治立场上的差异，甚至连架都吵不起来。许多社民党人和基民盟成员希望回归党之所以为党的根本所在，他们需要重新定义和厘清党的性质和特征。

基民盟：年轻保守派与默克尔的中间路线水火不容

面对新的形势，两大政党的领导层已经疲态尽现。随着老一代领导人退出，社民党和基民盟都面临代际转换，许多党员希望重塑领导层，注入新鲜血液。但问题在于，接替党内领导层的这批人，并不希望推倒一切，从头开始。就拿社民党候任主席纳勒斯来说，尽管她比默克尔小16岁，但她从政的时间并不比默克尔短。默克尔1989年在东德加入民主觉醒党的时候，纳勒斯已经在她的家乡魏勒组建了社民党的地区分部。让她再另起炉灶，重塑社民党，显然并不现实。

无论是社民党，还是基民盟，内部分裂已是必然。即使社民党最终还是通过全党投票，同意与联盟党组建大联合政府，但围绕着组阁议题而产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矛盾，仍会继续演变，进一步撕裂社民党；而在基民盟内部，以延斯·施潘为核心的保守派和默克尔麾下的现代派之间，同样水火不容，越走越远。

37岁的延斯·施潘无疑已成为默克尔的基民盟内部最具影响力的反对者，他的身上有很多标签，代表着基民盟的年轻一代、保守主义传统和未来的方向。在最初泄露出来的基民盟内阁提名名单中，默克尔有意忽略施潘，而倾向于提名党内其他的保守派，如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基民盟主席尤利娅·克勒克纳，但这一名单在党内引起强烈异议。

尽管基民盟内的矛盾目前还没有像社民党这样公开化，充满戏剧性，但同样也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随着默克尔在党内的主导力下降，对于基民盟未来的方向，各种论调和利益纷争纷纷出台。

对于基民盟应该回归保守主义立场的争论从难民危机爆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并且，伴随着极右翼选择党的崛起，争论变得更加激烈。许多年轻的基民盟成员抱怨说，他们在大选拉票造势时，都不知道该向选民如何阐释基民盟的立场，尤其是在难民和同性恋问题上。“默克尔正在剥掉我们的保守主义外衣，”19岁的约翰尼斯·戈尔兹

(Johannes Golz)说,他是基民盟在波罗的海乌瑟多姆岛地区的青年会主席,在他看来,基民盟只有经过彻底的改造才能重新焕发生命。“必须给年轻人以机会,这样,我们才能找回我们的本真,”戈尔兹说。越来越多的基民盟党员认为,打着极右翼旗帜的选择党之所以崛起,正是因为基民盟放弃了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右翼立场,才给了选择党壮大的空间。

但是,默克尔坚持认为,基民盟必须继续进行现代性的改造,必须尽可能吸引大多数选民,极端化并不利于基民盟的发展。

明镜在线分析认为,社民党和基民盟长期执政形成德国政治稳定的基石,但民意基础已不复存在。两大老牌政党的支持率加起来,从上世纪70年代的90%以上,跌落到目前的49%,并且相对缓慢平和的下跌速度,在最近几个月出现加速下跌的迹象。

相对于欧盟其他国家,德国的政党体系比较稳定;政府频繁更迭,领导人走马灯似的换人,在德国并不多见。例如,意大利自1946年以来,已经更换过30位总理,61届内阁;相比而言,同一时期,德国只产生了8位总理。但这一稳定的政党体系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过去两党轮流坐庄或联合执政,如今却是7个政党进入议院。一党独大的局面不可能出现,必须两党甚至三党联合,才能组阁,政治稳定性大打折扣。

政党体系的不确定,尤其是主流政党陷入混乱和动荡,意味着德国作为欧盟政治稳定器的时代不复存在,德国政坛将提前进入后默克尔时代。

3 默克尔接班人浮出水面,右翼少壮派挑战默克尔

德国总理默克尔2月19日提名萨尔州州长安内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出任基民盟秘书长,接替因健康原因辞职的前秘书长彼得·陶贝尔(Peter Tauber)。

克兰普-卡伦鲍尔普遍被视为默克尔的接班人,人称“小默克尔”。作为默克尔最亲密的盟友,她在去年的萨尔州地方选举中率领基民盟取得关键性的胜利,并在保守党与社民党的组阁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在基民盟内部赢得广泛赞誉。此次,克兰普-卡伦鲍尔出任基民盟秘书长,标志着她从地方政治舞台走向全国,默克尔钦点“接班人”身份更加明显。

基民盟仍将维持“中间党派”色彩

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基民盟领导层对克兰普-卡伦鲍尔的提名表示“强烈支持”,她“将在国家层面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她说,在执政12年之后,基民盟正经历一个“困难、动荡”的时期,对基民盟的未来,需要进行内部讨论和反省,而克兰普-卡伦鲍尔是领导这一内部反省过程的合适人选。

克兰普-卡伦鲍尔表示接受提名,并将辞去萨尔州州长职务,“我们正经历德国(战后)政治史上最为艰难的时刻。我相信,在这种时候,你不能只是谈谈责任感,而应该时刻准备投身其中,”克兰普-卡伦鲍尔说。

谈到秘书长的角色。她表示,将带领基民盟走向一条“自我探索”和“程序再造”之路,为未来十年基民盟的发展确定新的方针纲领。当被问到她将要基民盟带向左翼还是右翼的时候,克兰普-卡伦鲍尔说,她对这种“分门别类的安排”没有兴趣,她将在重塑基民盟的过程中团结所有人,确保基民盟的“中间党派”色彩。

43岁的彼得·陶贝尔因重症肠炎住院治疗,不得不暂别政坛,陶贝尔在一篇名为《我为什么要让位秘书长》的博客中,正式宣布辞去秘书长一职,他表示,希望基民盟能够变得“更年轻,更多元,女性色彩浓厚一点”,“在我们的党员队伍里,年轻人

太少，女性更少，有移民背景的人也不足。”

党内入阁名单公布，年轻化趋势明显

伴随着默克尔第四次出任德国总理，基民盟内部对默克尔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基民盟需要引入新鲜血液，并且为后默克尔时代早做准备。将自己一手栽培的克兰普-卡伦鲍尔推向政治前台，有助于默克尔抵御党内保守派势力试图将基民盟“右”转的倾向，捍卫自己的政治遗产。显然，保守派对这一提名并不满意，他们希望默克尔提名党内右翼力量的领军人物、副财长延斯·施潘出任秘书长。

出于平衡党内各派力量的考虑，默克尔 2 月 25 日晚宣布，如果大联合政府成立，基民盟将有 6 名成员进入她的内阁，其中包括了党内的少壮派、温和派和长期的盟友。默克尔说，她在考虑内阁人选时努力在资历经验和年富力强之间寻求平衡，综合考虑，“这些成员比我年轻许多”，“我们可以组成一个高效的团队，以应对未来的挑战”，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6 位提名入阁成员中，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37 岁的延斯·施潘，他被提名为卫生部长。施潘是基民盟内部少壮派的代表人物，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一直持强烈批评态度，外界传言，他曾与基民盟姊妹党基社盟以及自民党的高层举行非正式会晤，讨论后默克尔时代的政治安排。从政治观点上看，施潘是基民盟内的另类，比默克尔更保守。他的提名立刻遭到左翼党和绿党的批评，他们指责施潘与德国制药业巨头关系紧密。

施潘目前还不到 40 岁，未来将成为基民盟内接替默克尔的强力人物，这次被提名为卫生部长，是默克尔向党内年轻力量代表青年联盟妥协的信号，青年联盟一直对默克尔的中间路线不满。这也是施潘首次进入联邦政府，从而为他以后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出任基民盟主席或总理候选人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

不过，另一方面，卫生部长在默克尔内阁中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作为内阁成员，施潘以后再要对默克尔政策说三道四恐怕就不合适了。况且，如果大联合政府如期成立，施潘作为内阁里的极端保守分子，政治上也会陷入孤立。默克尔巧妙地用这一记妙招，化解了她在基民盟党内最大的敌人。

如果说卫生部长一职实际上是将施潘巧妙地“政治隔离”，那么，在其他几位内阁成员的提名上，默克尔就是游刃有余地挑选自己的党内盟友，能够贯彻自己温和、实用主义执政理念的人物。

善于团结各方力量，逐渐显露自己风格

克兰普-卡伦鲍尔 1962 年出生于德法边界上一个名叫弗尔克林根的小镇，在特里尔大学攻读政治和法律，此后，她一直在自己的家乡从政，一步步进入基民盟的高层。而她的丈夫则在家照顾 3 个儿子。

1999 年，克兰普-卡伦鲍尔进入萨尔州州议会，此后进入州政府工作，直至 2011 年成为萨尔州首位女州长。她善于团结各方意见，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赢得广泛赞誉。克兰普-卡伦鲍尔对社会议题态度较保守，如反对同性婚姻，但在维护劳工权益方面立场接近社民党为代表的中左阵营，如支持出台全国统一最低工资标准。

以钢铁和煤矿为主要产业的萨尔州是德国西部典型的“夕阳经济”州，经济停滞不前，工厂大量倒闭，失业人数众多，州财政入不敷出。克兰普-卡伦鲍尔上任后，一方面通过大幅度削减开支，减低负债，同时也积极与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协调，在具体政策上保持弹性。当地报纸《萨尔布吕肯人报》记者丹尼尔·基希评价说：“她总是希望能够协调所有人的利益，将他们拉到谈判桌前。因此，她的改革措施几乎没有遭遇街头抗议。”

克兰普-卡伦鲍尔为人理性、务实、干练，在党内民望颇高，已连续 4 届高票当选基民盟主席团成员，在萨尔州的民意支持率高达 80%。在去年的州议会选举中，尽管事前媒体预测社民党将获胜，但克兰普-卡伦鲍尔率领基民盟赢得 40.7% 的选票，比 2012 年选举高出 5.5%。这一结果出乎柏林预料，从而让她以黑马姿态成为德国政坛最具潜力的新星。

克兰普-卡伦鲍尔冷静、现实的风格与默克尔如出一辙，但“小默克尔”的外号给她带来政治知名度的同时，也让她始终笼罩在默克尔的阴影下，在德国政治求新求变的当下，这一政治资产如果运用不当，有可能成为克兰普-卡伦鲍尔的负累。

克兰普-卡伦鲍尔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近几年，在一些问题上，她开始显现出自己的风格。2000 年，克兰普-卡伦鲍尔成为德国联邦州政府首位女性内务部长时，便以她的果断赢得了萨尔州警察队伍的好感，而默克尔对党内的司法领域事务从来不闻不问。

而在去年的萨尔州地方选举过程中，克兰普-卡伦鲍尔公开表示，禁止土耳其政治人物在萨尔州公开露面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全民公投拉票。显然，默克尔对这一表态并不满意。由于担心土耳其拒绝执行与欧盟签署的难民协议，从而引发新一轮难民潮，默克尔对埃尔多安一直持怀柔态度，对他试图通过全民公投攫取更大的权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克兰普-卡伦鲍尔抓住这一议题，显露自己的强硬风格，为她在基民盟内部赢得不少掌声，尽管土耳其政客来萨尔州为埃尔多安拉票一事最终证明不过是乌龙一场。

出任基民盟秘书长，对克兰普-卡伦鲍尔来说，表面上看来，职位反而降低了，因为根据德国宪法，州长的级别相当于内阁部长，而作为一政党的秘书长，却没有太多的政府权力，但基民盟秘书长却是克兰普-卡伦鲍尔踏入联邦政治圈内的一块重要跳板。

1998 年至 2000 年，默克尔也曾担任过基民盟秘书长，这段经历成为她跃升至党内领导层并在 2005 年成为总理的关键一步。在 2 月 19 日的提名新闻发布会上，默克尔对克兰普-卡伦鲍尔的欣赏溢于言表，甚至一时口误，称克兰普-卡伦鲍尔有望成为基民盟有史以来第一位女秘书长，“忘了”自己才是创造这个纪录的人。

默克尔栽培克兰普-卡伦鲍尔的良苦用心在此次组阁谈判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克兰普-卡伦鲍尔在党内的人缘非常好，但在党外，政治知名度不高，也缺乏联邦政府层面的工作履历，在与社民党的组阁谈判中，在默克尔的精心安排下，克兰普-卡伦鲍尔是基民盟内唯一一位同时担任两个谈判小组首席谈判官的官员，负责家庭政策和劳工政策。默克尔对克兰普-卡伦鲍尔在谈判中的表现非常满意，而克兰普-卡伦鲍尔也非常卖力，即使在最后一轮谈判时不幸遭遇车祸，脖子受伤，也轻伤不下火线，继续主持谈判。

美因茨大学的尤尔根·弗特（Jurgen Falter）认为，出任基民盟秘书长，将有助于克兰普-卡伦鲍尔建立自己的政治关系网，打造政治基础，扩大在党内的影响力。社民党新任主席安德里亚·纳勒斯（Andrea Nahles）、巴伐利亚候任州长马库斯·索德（Markus Söder），以及默克尔等德国政坛强力人物，都曾在党内秘书长的位子上干过多年。

4 默克尔称要警惕中国扩张巴尔干？“中国渗透论”显示欧洲深刻的不自信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舆论，尤其是德国媒体和智库不断抛出“中国渗透论”，称中国正在用经济投资和政治渗透分化欧洲，就连一向对华友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突然发出警告称，中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投资不能与政治诉求挂钩。这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合作持续升温

2月21日，默克尔在柏林会见来访的马其顿总理佐兰·扎埃夫（Zoran Zaev），在会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默克尔表示，德国支持自由贸易，但首先应该是互惠的。她说，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开放不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全方位的。“我对于中国希望在这里（巴尔干地区）扩大贸易合作以及投资没有异议，”默克尔说，“问题在于，经济关系是否与政治问题挂钩？”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将“与自由贸易的精神不符”。

默克尔的这一针对中国的表态显然是指“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国和中东欧地区合作。近几年，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与巴尔干国家的合作持续升温，罗马尼亚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投资最大的国家，塞尔维亚则成为“16+1”合作框架下落地成果较多的国家。据统计，中国通过中东欧16国进出口贸易额从2012年的521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587亿美元，增长13%。2016年，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超过8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机械、节能环保产业、旅游等领域。

中国在马其顿的投资并不多，远远不及希腊和塞尔维亚，中国的投资主要是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去年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马其顿时，扎埃夫还表示感谢中国的帮助。但是，马其顿目前正试图加入欧盟和北约。尽管欧盟对于这一地区的民族冲突和黑社会犯罪等问题心有疑虑，但同时也担心俄罗斯的影响力在巴尔干地区的渗透，因此启动了新的一体化行动。在新闻发布会上，默克尔也称赞马其顿在争取加入欧盟的道路上取得进展。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近几年在欧洲一些战略性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被人为地放大，欧盟内部一些人担心受惠于中国投资的巴尔干国家将会在欧盟内捍卫北京的利益，尤其是涉及人权和贸易的议题上。

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警告说，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的利益诉求过于开放，“有时候甚至会以牺牲欧洲的利益为代价”，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去年8月也曾在巴黎表示：“如果我们不制定一个（统一的欧洲）对华战略，那么中国就会继续分化欧洲。”

“中国渗透论”在德国学界开始流行

这种“中国渗透论”在2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达到一个小高潮，加布里尔在演讲中再次指责中国和俄罗斯试图对西方自由世界的秩序提出挑战。多个欧盟国家的与会代表都对中国的强势影响力提出警告。奥地利总理库尔茨（Sebastian Kurz）表示，美国一再从国际舞台上撤退，而这个“权力真空”正在被中国填补。

2017年2月13日，慕尼黑安全会议基金会就曾发表年度报告，指出国际安全环境面临二战以来最脆弱的时刻，世界有可能正在迈向后西方时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非西方国家开始建构世界事务，与1945年以来的国际秩序形成一种平行甚至有时不利的新框架。

这份以西方为中心的报告不无忧虑地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的三大挑战——

首先是西方世界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主义盛行。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后真相”世界里的信息操控手段，煽动恐惧情绪，借由选举和全民公投，在 10 多个西方国家掌权或参政。

其次，西方世界秩序出现裂痕。二战后和平秩序的主要基础，即“自由民主”的传播、自由贸易基础上的经济相互依赖和处理世界性事务的国际机构网络，都遭到民粹主义的系统性挑战。

第三，后西方甚至后秩序时代的形成。未来的世界秩序是否还将是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主导？西方秩序的核心价值和架构与中国等新兴国家强力推进的游戏新规则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

这份报告的论调显示出欧洲国家对于中国崛起之后强烈的失落感和不自信，由此而产生的“中国渗透论”在德国媒体和学界愈演愈烈。

指责中国分化欧盟成员国，搞各个击破

《明镜周刊》2月5日刊登专题报道，援引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和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室（GPPI）的最新研究报告称，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尝试借助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帮助影响欧盟高层的决策。

这份名为《威权主义盛行：中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上升》的报告认为，中国在欧洲快速增长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对威权主义的自信和扩张，正在对欧洲的自由民主价值和利益构成显著的威胁。中国凭借经济实力和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行力，正在全球范围内构筑战略影响力版图，从中长远的角度看，中国对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将超过俄罗斯。

报告称，“中国对欧盟国家分而治之的策略已经奏效，在欧盟内部及周边国家，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开始认同中国的理念和价值，尤其是涉及自由和人权的领域，中国的话语阐释正在被一些欧盟国家接受。”

报告认为，倾向于维护中国利益的欧盟国家包括希腊和匈牙利，因为他们需要依赖中国的投资，或者对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模式比较认可。比如，在深陷欧债危机的希腊，中国拿下了比雷埃夫斯港的二号和三号码头经营权，并在 2016 年以 3.685 亿欧元收购比港港务局 67% 的股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报告提出防止中国进一步“渗透”的几种解决方案，首先是要求欧盟成员国团结一致，加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尤其是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大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应该把欧盟的共同利益置于双边关系之上考虑。报告认为，采取“16+1”的模式，比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一对一”谈判的模式更有利于欧洲。其次，欧盟必须设立一套更具弹性的中国投资审查机制，尤其是要限制中国国有企业对欧盟企业的并购，除了高科技、重大公共基础设施等产业外，媒体等意识形态领域也禁止中国参与投资，此外，还必须限制欧盟政党接受中国政治献金。

由此可见，默克尔在与马其顿总理会谈后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国向巴尔干地区“渗透”，并非毫无先兆，而是近几年“新版中国威胁论”在欧洲政界、学术界和舆论场逐步发酵后的自然流露。专家指出，经济上讲，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16+1”框架下的合作，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德国在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延伸和市场，影响了德国的经济利益。而在政治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美国保守主义回潮和政治退缩，正逐步改变着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德国乃至整个欧盟面对这种大趋势所产生的不适应，加上英国脱欧后的自我迷失等，都让“中国渗透论”有了新的滋生土壤。

5 联邦法院判决，柴油车禁行，各地说了算

位于莱比锡的德国联邦行政法院 2 月 27 日就禁止柴油车上路做出裁决，允许地方政府禁止柴油车在城市道路行驶。这项裁定并不是禁止柴油车上路，而是将权力交给各州、市、县，他们有权下达柴油车禁令，为此联邦议院不必为空气达标专门立法。

这起诉讼最早源于一家名为“德国环境行动”（DUH）的环保组织，该组织以斯图加特和杜塞尔多夫的城市污染严重超标为由起诉巴登-符腾堡州和北威州。斯图加特一家法院判决，公众健康权比柴油车司机的权利更重要，柴油车禁行是控制空气污染最有效的办法。杜塞法院的裁定认为，在城市中对柴油车实施禁行，需要在细节上再仔细研究，不过，两家法院均认为，实施禁行是否合法仍有待商榷。巴登-符腾堡州和北威州州政府认为，控制空气污染必须制定全国标准，并上诉至莱比锡联邦行政法院要求裁决。

900 万辆超标排放柴油车受影响

联邦行政法院这一标志性的裁决从法律上为柴油车限行禁令开了绿灯，从而将正式拉开燃油车全面禁行的大幕，影响深远。根据这项裁决，各地方政府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对其相关法律进行调整，部分城市将在污染严重的时段对部分城市道路实施柴油车禁止通行。根据裁定，市政当局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对商用柴油车免除禁令，此外，因禁令而导致的柴油车贬值损失由车主自己承担，联邦政府不承担赔偿义务。

据德国官方统计数据，德国目前有 1500 万辆注册柴油车，其中约 600 万辆符合欧盟 6 排放标准，不在禁行之列，其余 900 万辆柴油车都将有可能受此项裁决影响。此外，还有数百万辆以柴油为动力的卡车、公交车和重型机械车辆都将受到禁令波及，尤其是公交车和商业货运柴油车，一旦受限，将给城市交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尽管目前德国还没有城市出台柴油车禁令，但德国柴油车的新车注册量已经明显下降，去年一年就下降 13%。而汽油车的新车注册量则增加了 14%。

为了应对柴油车禁令带来的交通混乱，多特蒙德市政府已经提前做好预案，对应急救援车辆、老年服务机构的车辆、食品运输车辆，以及城市服务车辆发放了几千张临时通行证，以保障这些车辆能够在禁行区域通行。

联邦行政法院的裁决出台后，德国境内约有 60 个空气污染严重超标的城市将首当其冲，其中包括像汉堡这样氮氧化物排放一直超标的城市，柴油车禁行的压力增大。

联邦环境署 2 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70 个德国城市空气中的氮氧化物浓度超标，其中 20 个城市严重超标。

目前，减轻污染排放的压力都在市政府层面。在污染最为严重的北威州，2016 年，超过 30 个城市空气污染指数超过 40 微克/每平方米的法定上限。在面对柴油车禁令方面，它们毫无应对手段，尽管联邦政府承诺将提供数百万欧元资金用于新购清洁能源巴士以及更新改造城市交通管理系统。

默克尔政府对柴油车禁令一直持反对态度，认为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治理不能简单地通过对老旧柴油车禁行来实现。德国环境部长芭芭拉·亨德里克斯（Barbara Hendricks）称：“联邦法院并没有颁布禁令，而只是对法律作出了澄清。我们的态度是禁行不能强制执行。”默克尔则表示，即使有些城市选择执行柴油车禁令，也不会对德国所有的汽车司机造成麻烦。下一步，联邦政府将和各地方政府、市政当局协商，如何实施柴油车禁令。“（这项裁定）只涉及那些污染问题比较严重的城市，并不

会影响整个德国和所有的司机，”默克尔说。

对德国政府来说，莱比锡法院的裁决只是麻烦的第一步。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是否就德国政府在限制城市污染排放方面毫无作为向欧洲法院提起诉讼，一旦欧盟发起诉讼，德国政府为保持本国汽车制造业的繁荣而无视公众健康的“懒政”行为无疑将大白天下，默克尔政府将因此陷入尴尬境地。

“蓝色标签”制度遭汽车业反对

近两年来，德国有部分城市提出引入“蓝色标签”制度，为排放达标的洁净柴油车发放蓝色标签，允许这些车上路。但这一提议在联邦及州政府层面始终未能得到积极响应，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污染门”丑闻曝光之后，公众对柴油车所谓的“达标”持严重怀疑态度，因为许多柴油车都安装了软件，能够篡改排放数据，甚至根据不同的驾驶路况关闭排放过滤系统。

2015年，德国大众汽车因这一软件作弊行为，在美国被处以巨额罚款。但在德国本土，大众并没有因为柴油车软件作弊而人人喊打。刚刚卸任的交通部长、基社盟成员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在任期内极力反对“蓝色标签”的做法，也没有对大众汽车采取任何限制措施，而是责令大众汽车“更新软件”，使其轻易过关。

代表汽车制造业从业人员利益的工会组织德国金属行业工会（IG Metall）也对蓝色标签的做法持反对态度。该工会的主席霍夫曼（Jörg Hofmann）称，环保组织建议实行“蓝色标签”制度，是对老一代柴油车车主“无情的财产剥夺”，因为现在老一代柴油车在二手车市场上的价格已经大跌，仅为新车售价的一半左右，比去年下降了3.4%。德国金属行业公会担心柴油车禁行会导致汽车制造业岗位大量流失。

不过，在联邦层面，蓝色标签似乎已经得到认可。在联邦行政法院的裁决出台后，联邦环境局要求联邦政府推出淡蓝和深蓝两种不同的环保标签，以区分软件升级后的欧V柴油车和更加洁净的欧6d标准。大多数德国城市，淡蓝色标签的柴油车都可以通行，只有污染特别严重的城市，可以只允许深蓝色标签柴油车通行。

在欧盟层面，面对欧盟委员会可能发起的诉讼，联邦政府也开始重视柴油车污染问题。总理府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在组阁谈判结束后，立刻抽空给欧盟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提出一系列德国政府计划出台的限制氮氧化物排放的措施，甚至表示，对城市公共交通实行免费，以减少私人汽车的上路。

阿尔特迈尔在信中提出3个建议，一是德国政府计划修改交通法规，允许关闭私人道路；二是修改法律，政府将强制要求汽车共享企业和出租车公司使用电动汽车；三是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减少尾气排放，这也意味着，联邦政府将迫使汽车制造商回收在实际驾驶过程中氮氧化物排放严重超标的柴油车。这三项建议是德国政府之前始终不肯承诺的内容，尤其是第三点，遭到德国主要汽车商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召回污染严重的私人车辆，排放不达标的城市大巴也在召回之列，并且数量巨大，其经济损失将是德国汽车商难以承受的。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18年3月10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武亚平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